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王文利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1978年以来, 中国分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分配注重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 试图为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提出一条思路。在中国实施这条思路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为了消除收入差距对发展的制约, 我们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原则, 但不能忽视公平。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非规范现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仍然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 尤其是在转变发展战略, 实现城乡共融和工农并重的发展上, 必须依靠政府才能较好地解决“二元化”的收入差距问题。

关键词: 分配制度; 效率与公平; “两个注重”原则

中图分类号: F1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2-0024-05

Retrospect and consider Chinese income distribution transition

WANG Wen-li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Since 1978, China has reformed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 and has progressively established distribution modes of socialist market. The income level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ising quickly and the income gap has apparently been widened. We should still insist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preference and dispassion.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attention to two things” is not a best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resolve injustice issues in elementary distribution.

Key words: income distribution; efficient and dispassion; principle of “Giving attention to two things”

中国经济改革是以激励机制的改变和分配制度的变化为开端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收入分配的格局也发生巨大的演变。认真总结 20 多年分配制度改革的经验, 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对于今后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

一、收入分配研究的分类

作为人类社会最一般的经济范畴, 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配问题在经济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而

且在于它能够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并反映出这种利益关系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分配关系是否合理, 分配制度是否有效, 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和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简单来说, 收入分配是指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在一个社会内部的不同集团之间、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割或占有。收入分配作为一种经济活动, 是分配主体与分配客体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运动。从表面上看, 反映的是分配主体分割占有分配客体的“人与物”的关系, 而从本质内容上则反映了分配主体之间的“人与人”的权利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决定“人与物”的关系。按照分配的依据和结果, 收入分配可分为功能性收

入分配和规模性收入分配。

功能性收入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又称要素贡献收入分配,它是反映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生产要素投入(贡献)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从收入来源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资本、土地、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得到的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规模及其贡献相对应的收入份额是多少。在西方国家,工资比率和利润比率分别用来反映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主要是劳动力所有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作为分配主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别和对比关系。规模性收入分配(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又称个人或家庭收入分配,它主要研究国民收入在各类家庭或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是从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来研究其中各个阶层的家庭或人口所得到的最终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多少^[1]。这种收入分配一般是通过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收入分配频率图等,来衡量说明社会收入分配的差别状况和公平程度。在改革初期,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和研讨主要集中在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争论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对规模性收入分配的研究不断得到加强和深化。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一)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1978年到1987年,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一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明在现阶段并不具备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二是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引入和体现利益机制,否定了在分配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些政策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基本精神,为后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打下了基础;三是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对分配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阶段分配改革的实践是以农村20世纪80年代初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从分配方面来说,责任制明确划分了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最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们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农村分配改革的成功对以后中国分配体制的改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

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探索。一是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二是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是在收入分配方面,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是中央重要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劳动收入可以参加分配。在分配实践上,首先是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企业职工的工资和奖金要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但工效挂钩的办法只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新体制的一个过渡形式,没有完全突破原企业体制框架。其次,1984年以后,我国的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分配形式上实行按要素分配。

(三)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明确了分配体制改革的客观评判依据和最终实现目标;二是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分配体制的改革走上了一条既遵循宏观经济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三是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从而明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地位,是对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具体化;四是提出不断完善分配结构,既要坚持效率优先,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兼顾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在分配实践上,国有企业的工资改革中提出了“两个低于”的原则。在职工工资总额增长率低于企业经济效益增长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劳动就业供求变化和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自主决定工资水平和内部分配方式。“两个低于”使企业工资总量调整的主体由政府转到了企业,迫使企业处理好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关系,自觉转换经营机制。

(四)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和明确按要素分配的模式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一是

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没有否认知识、资源、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作用;二是明确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三是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做出了清晰的回答。我们对于公平与效率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我们的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人先富起来,合理搞好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十六大报告进一步回答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实际上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具体体现,指出了贯彻这一原则的思路以及市场与政府在调节效率与公平相互关系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绩效分析

中国在改革前或改革之初,分配制度总的特点是平均与不平均分配并存。平均分配的表现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城市的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农村的基尼系数略高,但多数估计都在 0.21~0.24 之间。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基尼系数则在 0.37~0.43 之间,农村的基尼系数则在 0.34~0.40 之间^[2]。因此,可以说我国在改革以前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而不平均分配的表现是:1)人为的城乡分割和工业战略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据世界银行的计算,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 2.5(1979 年),比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要高(平均约为 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 2.2);2)在实物分配的情况下,80%的农村居民并不享有城镇居民所获得的补贴;3)凭借权力参与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4)工资的长期冻结。可以说,平等中存在着

不平等,不平等中又存在着平等的状况,是改革前计划分配制度下分配格局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分配性质的认识和分配制度的变迁,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按照改革初期提出的目标发展的,但也有不少变化超出了原来的设想。总的特点是平均分配被打破,不平均分配出现新的特点。

平均分配被打破的主要表现是基尼系数的变化。首先是全国的基尼系数。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0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是 0.343,1995 年为 0.389,2000 年为 0.417,这已经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 的标准。其次是农村和城镇基尼系数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其中,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21 上升到 2000 年的 0.35,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 1978 年的 0.16 上升到 2000 年的 0.32^[3]。

不平均分配,或者说收入差距出现的复杂变化,按照形成的原因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合理合法收入造成的;二是合法不合理收入造成的;三是不合法收入造成的。此处的“理”是指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自由的竞争原则;“法”则是指各级政府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1)合理合法收入所得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具有激励效应,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但是如果造成过大的分配差距,就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会产生负面的社会影响。这种情况只有依靠政府在分配结果上利用税收等再分配政策进行调节。2)合法不合理的收入差距的主要表现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由于计算口径和方法的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的估计也往往不一致。但对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先缩小后扩大的总趋势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分歧的。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 1.5,这一比率超过 2 的极为罕见。但我国在 1995 年这一比率已经达到 2.5。而且,如果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实物性福利,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会增加 72%^[4]。即使考虑到农民进城打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因素之后,1995 年城乡实际收入的比率也在 4 左右。即使根据 2002 年 3 月人代会公布的官方数据,200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860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2366 元,其比率也达 2.899^[3]。同时,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三大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有

了明显的扩大。例如,1978年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出87%;到了1995年则高出124%。我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课题组的两次抽样调查的数据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趋势。数据还表明,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显著地高于城市区域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垄断性行业与非垄断性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与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的职工年人均工资相比,1978年是1.81倍,1980年缩小至1.68倍,1985年又扩大到1.81倍。此后呈缩小趋势,1987年降至1.58倍,但其后又开始扩大,到1990年达到1.76倍,1995年增至2.23倍,1999年增至2.49倍,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偏向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的旧战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倾斜政策以及拥有垄断资源的部门凭借垄断地位获得的垄断收入。3) 不合法收入主要是通过“寻租”活动和内部人控制以及权钱交易,加上其他非法行为获得的非法收入。“寻租”活动扩大了收入的差距并且是形成高收入阶层的重要因素。内部人通过控制公有资产占有量而转化为本部门、本地区和本单位乃至有关个人的利益。这部分利益的分配很不透明,也很不均等。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都同内部人控制有关。权钱交易所造成的分配不均,更是法理难容。一项测算表明,如果把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0.397作为正常收入差异程度,若把一系列非规范收入和非法收入等估算在内,居民基尼系数会达到0.45左右^[3]。可见,这些非法收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变化的总体趋势,世界银行是这样评价的:“更富了,但更不平等了”^[4]。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20多年来,收入分配的不平均有了明显的扩大,但是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在国民财富不断增长基础上发生的。要消除这种收入不平均带来的影响,也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才能解决。

四、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一)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但不能忽视公平

根据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500美元左右,基尼系数才开始下降。如果这个经验具有普遍性,那么目前我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左

右的现实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仍有扩大的可能,也就是说,我国基尼系数0.45左右只是处于倒U曲线的上升阶段,收入差距仍可能扩大。根据我国发展速度进行统计预测,2020年我国人均GDP可达到3000美元以上。在此之前约2010年,人均GDP可能达到1500美元,基尼系数将转为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也会出现缩小的趋势。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等着基尼系数自己下降而不去采取主动调节收入差距的措施呢?

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的实施,确实使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了起来,但是收入差距在扩大也是事实。如果忽视“兼顾公平”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必定会影响到“效率”的优先地位。一方面,分配是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富者收入大于支出,贫者无消费能力,有效需求不足就会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分配能够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认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社会动荡混乱的方面。”^[5]因为非规范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会影响人们工作和生产的效率,甚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我国已经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也凸显出来。进入小康社会说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积聚了一定的财力和物力;而收入差距拉大不仅成为影响当前社会阶层关系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而且可能影响中国下一步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关注公平,关注贫富差距,并不是要忽视效率,更不是要绝对平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依然是决定效率优先的前提,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仍然要坚持效率优先,坚持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不能忽视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公平问题,主要是机会均等的公平。

(二)进一步认识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似乎已经明确界定了政府和市场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同职能。有的理论认为,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就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政府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就不应直接以指令方式介入,以防止市场失灵。但笔者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非规范现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从前面分析可知,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情况是属于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合理合法所得造成的收入差距,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应该加以肯定。世界银行的报告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这样分析的:“将工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是转轨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让市场决定工资会创造出高效率的激励因素,而这种激励因素对于成功的改革是至关重要的”。^[6]第二种情况是合法但不合理收入造成的差距,这属于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却造成了事实上的分配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第三种情况是不合法收入造成的差距过大,就是不应该支付的,或者说是应该防止和避免的改革的成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对于第一种情况是正确的,但对于后两种情况则是不对的。垄断行业和部门凭借其垄断地位占有和支配优势资源,获得超额利润,转化为本部门职工的高收入,这种合法但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就应该由政府来加以限制,打破垄断,使资源优化配置,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得以缩小;对于在一定时期必须保留垄断的行业和部门,其收入分配标准应纳入国家监管之下。就业问题是我国将来一段时间内比较棘手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大量失业现象,也是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长期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是吸收劳动力的重要产业,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和指导,这些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受到很大限制。这些产业发展不起来,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失业以及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农民收入水平低和增长缓慢,地区收入差距的解决也需要政府在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扶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再分配领域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初次分配领域,就不仅仅要关注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对于第三种情况,就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消除的问题,是国家凭借暴力手段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强制干预。

(三)实施城乡并重战略,解决“二元化”的收入差距

我国市场巨大主要是农村市场潜力巨大,只有农民收入和农村购买力有所提高,潜在的市场才能转变为真实的市场,扩大内需的方针才能真正落实。而现在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而且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的障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和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的作用。农民收入水平

低和增长缓慢,是城乡经济发展失衡、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工业和经济发展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城市工业提供积累,这是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具有规律性的过程。但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时期时,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应该共同发展,这也是工业国的发展过程。因此,我国工业化基础建立后,工业应该回报和支持农业发展。这种转变必须依靠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来完成。这就要逐步改变过去的工业优先、轻视农业的发展思路,实行工农并重,城乡共融的发展战略,使过大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要达到这种“公平”发展的局面,国家必须采取一定的具体措施:1)在分配起点上,使农村居民在进入分配过程之前使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尽可能地平等,主要包括劳动者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以及财产占有权力的平等;2)在分配过程中,建立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决定机制,包括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两个方面。当前,破除户籍、福利和就业等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缩小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有力保障;3)在分配结果上,通过政府的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对收入分配关系进行第二次调整。一方面对农村高收入者进行合理调节;另一方面,要通过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建立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农村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

五、结 语

1978年以来,我国在分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到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探索,再到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十六大的报告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处理公平效率关系的“两个注重”原则。但这条思路在我国的实施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当前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非规范和不公平现象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需要政府插手进行管理,在初次分配领域创造自由竞争的依靠合理合法手段获得收入的市场环境,尤其是要转变发展战略,实施城乡共融和工农并重的发展思路,较好地解决“二元化”的收入差距问题。因此,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不是不作为,而是要积极作为。但这种积极作为不是要干预市场机制,而是

(下转第62页)

不骄、败不馁的道德风貌;裁判员的严格执法;观众为胜者欢呼,为失败者加油的热情;同时青年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获得乐趣、竞争得胜的成就感等,这一切都能具体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实际上,在奥林匹克运动中体现的奥林匹克精神十分丰富,如“更快、更高、更强”的不断向上的竞争精神,“参与比赛更重要的口号精神,”“人的和谐发展”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尊重精神等。

三、大学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途径

目前,我国正以积极的姿态,以新的奥运理念准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力使北京奥运会办成历史上最为出色的奥运会。为此,高校体育应以举办奥运会为契机,针对大学生的特点,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体育文化素质。

(1)高校体育课程中开设奥林匹克运动的选修课程,从而促使大学生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有深入地理解,并能够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这是开展奥林匹克教育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利条件。

(2)发挥高校大众传播媒体的功能作用,广泛传播奥林匹克运动文化及其价值与理念,让大学生深入认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对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

展的作用与大力开展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

(3)在高校体育教育活动中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奥林匹克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群众性活动和竞赛活动,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奥林匹克运动中来,让大学生感受体验并领略奥林匹克运动的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 [1]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奥林匹克宪章[Z].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3.
- [2] 熊斗寅. 人文奥运之我见[J]. 体育与科学, 2001, 22(6).
- [3] 彭永捷, 张志伟, 韩东晖. 人文奥运[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
- [4] 全国体育学院通用教材, 奥林匹克运动[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3.
- [5] 谢亚龙. 奥林匹克研究[M].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4.
- [6] 任海. 奥林匹克运动百科[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 [7] 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 [8] 马岳良. 试论北京奥运会前我国青少年的奥林匹克教育问题[J]. 体育与科学, 2003, 24(2).
- [9] 刘秀兰, 贾爱萍. 奥林匹克主义的人文教育意义探讨[J]. 体育与科学, 2003, 24(2).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 28 页)

创造使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市场环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把公平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公平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也是一个由机会平等、按贡献分配以及社会调节等原则组成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则体系。显然,只有立足于公平的基本理念与规则,才有可能既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才有可能既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秩序,又逐渐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

参考文献:

- [1] 韩保江. 现代西方收入分配制度变迁与贡献[M]. 济

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2] 赵人伟. 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J]. 经济学动态, 2002 (9).
- [3] 刘国光. 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J]. 经济学动态, 2003 (5).
- [4] 世界银行. 共享增长的收入: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 [5] 阿瑟·刘易斯. 发展计划[M].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 [6]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从计划到市场[C].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陈志和]